

陈翰伯是谁？

在出版界之外，几乎很少有人知道陈翰伯这个名字。即便这位老出版人的经历足够传奇：燕京大学高材生，老师是埃德加·斯诺，据说斯诺到延安，便是他张罗的；参加过一·二九学生运动，解放前在国民党统治区办过报。不久前，在陈翰伯诞辰100周年纪念会上，他的这些传奇经历再次被人提及。然而，真正为人津津乐道的依然是他“皓首出书”的壮举：推出一系列有影响力的辞书和汉译西方经典著作，直到现在依然让读者受惠；打破“文革”后的读书禁区，推动了思想解放。



陈翰伯是谁？ ——一位老出版人的书籍旧梦

本报记者 吉祥

商务印书馆的“中兴之臣”

商务印书馆原总经理林尔蔚回忆，1958年商务印书馆重新成立时，来了两个人，一位是总经理郭敬，一位是总编辑陈翰伯，陈翰伯此前主管中宣部《学习》杂志的编辑工作。商务印书馆当时归北京市出版局主管，后来因郭敬调任北京市出版局局长，陈翰伯便身兼总经理和总编辑。主政商务印书馆的14年特别是“文革”前的8年时间，奠定了陈翰伯在出版界的地位。在商务印书馆的老人们眼里，陈翰伯与民国时期掌管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齐名，被认为是商务印书馆的“中兴之臣”。

在商务印书馆，陈翰伯做的第一件大事是从三联书店接下了“翻译世界学术著作规划”，他调动在学术界的各种关系，精选1614种书作为商务印书馆中长期出版书目，在1963年形成《翻译和出版外国哲学社会科学重要著作十年规划(1963-1972)》，有计划、有组织地翻译出版

了大量有价值的外国学术著作。

林尔蔚说，一千多种书被分为哲学、经济、社会主义学派、政治学、法学、语言、历史、地理等九类，成为后来问世的《汉译世界名著学术丛书》的基础。书目确定后，商务印书馆便四处延揽翻译名家。然而，在政治运动中，一批学者和翻译家被划为“右派”，丧失了从事研究工作的权利。在这种状况下，陈翰伯主持的商务印书馆冒着很大的风险，将一些以前留学回来的、名校毕业但有历史问题或政治问题的人才搜罗进了编辑室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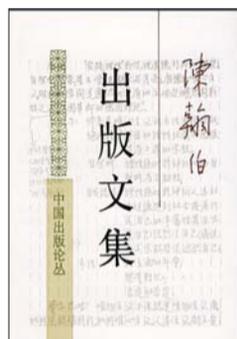
陈翰伯为人称道的一个故事是，在政治环境依然没有大改变的情况下，他卷着铺盖到北大“蹲点”，按照拟定的学者名录一个个寻访。正是在陈翰伯的执着努力下，众多“靠边站”的专家学者如朱光潜、贺麟、王以铸得以出山，担当古典名著的翻译工作，从而文有所用。这段经历当时虽未给陈翰伯带

来大的影响，但在“文革”中，陈翰伯没能躲过打击，被批判为“招降纳叛”。

选定了书目、译者，书的出版同样要经历风险。当时，商务印书馆推出的译著中，除了有马克思主义著作，也有一些非马克思主义著作，其中有的甚至还与马克思主义唱反调。这很容易被扣上“向资产阶级投降”、“为帝国主义张目”的大帽子，来自主管领导的批评更是给陈翰伯和同事不小的压力。

好在陈翰伯多年革命经历培养的政治智慧发挥了作用，为了让这些译著问世，商务印书馆在每一本译著的前面都加上一篇批评性的序言，以“消毒”的名义划清界限，有一些陈翰伯认为存在风险的书，便以灰皮书的面目示人，并注明“供批判用”。这套《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》之后陆续出版，一直到现在仍在继续，成为很多大学师生的“标配”。

【相关阅读】



《陈翰伯出版文集》
陈翰伯 著
中国书籍出版社



《也无风雨也无晴》
沈昌文 著
海豚出版社



《书商的旧梦》
沈昌文 著
上海书店出版社



《<读书>十年》
扬之水 著
中华书局



《这一代的书香》
俞晓群 著
浙江大学出版社



《前辈：从张元济到陈原》
俞晓群 著
上海书店出版社

主办《读书》杂志，推动思想解放

“文革”后，陈翰伯复出工作，担任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代局长。1979年，他和陈原、范用一起策划主办了《读书》杂志。著名出版人、曾担任《读书》主编的沈昌文在新著《也无风雨也无晴》中回忆了这段经历。他在书中说，这三位出版界的元老在政治环境刚宽松的情况下，便筹备创办《读书》杂志，与他们的出版情结有关。“陈翰伯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就办过这个名称的杂志。范用所在的三联书店办有《读书生活》杂志。解放后的出版总署也办过《读书》，陈原一度是它的主管。”沈昌文说。一个可以佐证的例子是，1970年左右，下放湖北咸宁干校的陈原和陈翰伯谈起办刊物，当时他们就设想，一旦有条件，还是要办《读书》杂志。而在《读书》杂志的筹备会上，陈翰伯坚定地说：“我们这些人，已把命交出了几次，这种时候，还有什么好怕的！”这三位老人把《读书》定性为“以书为中心的评论性刊物”。沈昌文在书中回忆，后来主管出版的领导告诉他，《读书》在当年这么定位属于越矩，因为只有像《红旗》这样的党刊才可以叫“思想评论”，《读书》能够破例，只因为陈翰

伯的推动。

在《读书》杂志先期筹备阶段，三位出版元老利用各自的人脉扩充了编辑部人员，陈翰伯请来的是著名翻译家冯亦代。冯亦代“文革”时被划为“美蒋特务”、“死不悔改的右派”，陈翰伯邀请他出山时，他刚恢复名誉，这激发了他的干劲。后来，冯亦代又利用自己的关系请来了著名漫画家丁聪做版面，后者同样曾是一位大“右派”。

1979年4月，创刊号的推出让《读书》引起社会震动。在杂志创刊号上，编辑刊登了李洪林的《读书无禁区》一文，这篇文章在思想界引发轩然大波，很快给杂志带来了意想不到的麻烦。有人批评此文的宗旨是“不要党的领导，反对行政干预，主张放任自流”。更有甚者，批评文章中没有在“毛泽东”后面加“主席”，属于反动思想。沈昌文在书中说，《读书无禁区》的原标题是“打破读书禁区”，范用在发稿时作了修改。“我当时心里就是这么想的，因为毛泽东读书就没有什么禁区。”给毛泽东买过几年书的范用说。

围绕这篇文章的争论并未停

止，1981年，在《读书》创刊两周年的时候，沈昌文邀请陈翰伯执笔写了一篇《两周年告读者》，既是表态支持，也重申了杂志“读书无禁区”的办刊宗旨。在这篇文章中，陈翰伯写道：“探索真理的工作绝不是一代人所能完成的。听凭某一圣哲一言定鼎的办法，更是不足为训。我们愿意和读者一起在激荡的思想海洋里，各自拿出一点智慧来……”

沈昌文记得，为了改变“文革”时文章中盛行的大话、空话与戴帽子、排位子等弊病，陈翰伯对《读书》编辑工作写过11条改进文风意见，其中一条就是“尽量不用‘我们不知道’、‘我们认为’之类的话头，有时可用少量第一人称”。陈翰伯一直强调作者与读者的平等。一次，沈昌文为《读书》写了一篇文章，拿去给陈翰伯看。他看后把沈昌文找去，郑重其事地说：“沈昌文，你以后写东西能不能永远不要用这种口气：说读者‘应当’如何如何。你知道，我们同读者是平等的，没权利教训读者‘应当’做什么、‘不应当’做什么。你如果要在《读书》工作，请你以后永远不要对读者用‘应当’这类字眼。”

倡导读书，每年给编辑放一个月的读书假

陈翰伯另一个被人铭记的工作是参与主持了大型辞书《辞海》、《辞源》、《汉语大词典》的出版。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，我国的辞书主要是一本《新华字典》，陈翰伯等一批出版人一直想改变“大国家，小字典”的状况。不过，编撰辞书异常艰难，陈翰伯的老搭档、出版家陈原就曾说过，“编词典的工作不是人干的”。陈翰伯主抓了《汉语大词典》的工作，这个大项目从1976年匆匆开始，直到1994年才完成，此时距离陈翰伯去世已经6年了。

在陈翰伯诞辰100周年的纪念会上，商务印书馆的老人们对他充满感念。这位老出版家当时做的很多事情，至今看来仍旧不失魄力。林尔蔚回忆，陈翰伯1958年到商务印书馆工作后，他在馆里提倡了几件事情，一个是倡导读书，每年给编辑一个月的读书假，要求编辑读完以后写一篇文章；另外就是办《简讯》，每个礼拜单位里有什么事儿一条一条写，“另外他提倡编辑写《外国历史小丛书》，陈翰伯就是要锻炼干部，要大家练笔。”在当时人才严重缺乏

的情况下，陈翰伯的这些举动对锻炼队伍意义重大。

陈翰伯的果断与勇气不仅仅体现在主持汉译世界名著方面。1955年，商务印书馆准备重印张岱年20年前出版的《中国哲学大纲》一书。然而就在书即将付印之际，张岱年却突然于1957年被划为“右派”分子，如果此时再出这本书，很显然就成了一个政治问题。刚刚到任的陈翰伯力排众议，决定出版。当然，书籍不能以张岱年名义刊发，商务印书馆使用了“宇同”的笔名，终于让这本书面世。



悦读·分享

扫码关注齐鲁晚报副刊微信“青未了”